

特區保衛者叢書

TEQU BAOWEIZHE CONGSHU

中國武警第一旅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广东省边防总队第七支队

编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东力
装帧设计：陈士修



ISBN 7-80615-056-0



9 787806 150566 >

ISBN 7-80615-056-0/1·5
定价：全套 68 元 单册 8.00 元

中国武警第一旅

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第七支队编

本书编委会

主 任	何发菊		
副主任	徐根如	甘德华	
委 员	林国其	黄春生	宋广南
	郑裕兴	尹大悦	王奎成
	王庆平	吴庆灵	冯文慈
	曾云波	甘名飞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



七支队领导班子学习《邓小平文选》

右起(二)为徐根如政委 右起(三)为何发菊支队长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慰问七支队官兵



威武严正的部队阵营

武警战士守卫在二线上



跟踪追击通缉犯



盾棍操



参加 1994 年治理布吉河

张劳逸、莫启来、纪穉园 摄影

武警廣東省邊防總隊七支隊

發揚傳統保持光榮
宗旨做党和人民的
忠誠衛士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胡之光



特 良 工 士
南 國 精 兵

劉殿玉
一九四四年十月

公安部边防局副局长刘殿玉同志为本书题词

改革開放的衛士
擔任人民的外

李 寒 斌
五月十五日

公安部边防局副局长李 寒同志为本书题词

序 言

深圳经济特区已度过了她的十四岁生日。十四年来,深圳以自己骄人的经济成就和改革探索赢得了国人的赞叹与世界的瞩目。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成千上万的科学工作者、企业家、工人、干部、教师、医生……也离不开特区的保卫者: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公安干警、海关工作人员。是他们日日夜夜守卫在海、边防线上,守卫在特区管理线上,保卫了特区的安全;是他们用自己的青春与生命与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是他们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勇于吃苦,乐于奉献,在特大自然灾害面前抢救了无数的人民生命财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他们与地方开展“共建”活动,帮助和推动了特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使深圳获得了“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称号;是他们搞绿化、修道路、扶贫困,不仅保卫了特区,而且还积极地支援了特区的“四化”建设。对于他们的劳苦与功绩,特区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特区人民永远感谢他们!

党中央号召广东省二十年超过“四小龙”,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深圳更须先走一步。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前途光明。我们一定要加强军民团结、警民团结,抓住机遇,再创优势,坚定不移地搞好改革开放,使深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感谢海天出版社的编辑们为我们编辑、出版《特区保卫者丛书》。我们相信这套丛书必将成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并受到人民的喜爱。

丛书编委会

目 录

为了神圣的国徽	莫晓培 1
镌刻在二线上的忠诚	莫晓培 63
心血浇铸的大厦	杨彦庄 87
警民共建谱华章	杨彦庄 115
8·10 席卷鹏城的飓风	小 励 136
面对蘑菇云的勇士们	曾云波 151
武警,正义之剑出鞘	小 励 163
千里莺啼绿映红	张木荣 192
边关何处不风流	张木荣 207
菠萝山之歌	张木荣 224
特区英魂曲	张木荣 230
一个带兵人的故事	张木荣 240
追求明月清风的人	张木荣 251
盐田,那一片蓝蓝的岁月	张木荣 265
光与影的传奇	张木荣 278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小 励 292

为了神圣的国徽

——武警广东省七支队简史

莫晓培

公元 1979 年，造成十年浩劫的“文革”已经结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已经被彻底粉碎，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正在涌动着“改革开放、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春潮，十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鼓舞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开始了一次令世界瞩目的新的长征。

然而，在这艳阳高照，东风万里的大好形势下，却存在着一股逆流。毗邻香港的宝安、东莞等地，本是富庶之乡，可是经过“左”的路线的干扰和“文革”动乱的破坏，这里人民的生活水平与香港、新界居民本来正在缩小的差距现在又拉开很远的距离，逃港风像瘟疫一样在蔓延，荒唐离奇的谣言更是推波助澜，许多人丢下祖祖辈辈耕种过的土地，离开生他养他的家园，一齐涌向深圳，涌向罗湖海关、文锦渡海关、沙头角海关，涌向与港九隔海相望的蛇口半岛。

面对这股越刮越烈的逃港风，社会主义的敌人或幸灾乐祸，或弹冠相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却心急如焚。大量的非法移民不仅使宝安、东莞等地的大批田园丢荒，滞后这一带的经济建设，而且严重影响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声誉和改革开放的形象。因此各级党委、政府不得不把工作重心转到劝阻、堵截外逃人员的工作上来。深圳地区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六团和边防检查站，他们直接担负着反外逃、内潜的重担，在他们的身后，解放军野战部队还设置了第二线、第三线，在一、二线之间的空隙里还有许多民兵哨卡。这样一来必然耗费很多经费，而且长期由野战军担负反外逃的任务也不合适。根据这

种情况,于是,中央决定成立一支武警部队——武警广东省支队,这支部队应在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领导下,接替野战军,担负起反外逃的任务。

一 建军花县

1979年6—8月间,省公安厅从拱北检查站抽调了一名副政委王海亭,由他负责抓筹建中的武警广东省支队的政治工作;从黄埔检查站抽调副站长祁忠堂抓支队的军事工作;又从全广东省各边防检查站和各单位抽调了100名左右基层骨干力量,他们中有老的队长和优秀的班、排长;此外,还从各边防检查站、支队抽调了一些参谋、干事担任中队的干部;组建了四、五个连。1979年底,定了1000名征兵名额,这样,支队、大队、中队的架子就搭起来了。

这是“文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组建的第一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这支部队组建在广东省花县百步梯公社。

但是,这时的广东省支队还只是一个雏形,为了加强领导,使支队能尽快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能完成重大任务的部队,上级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商调了几名支队的领导:将原守备二团的政委王殿富同志调广东省支队任政委;将边防六团副团长王功坚同志调来任支队长;将台山县武装部副部长杨亚尧同志调来任副支队长;将六团政治处主任陈奕瑜同志调来任政治处主任;将独立师三团的姜炳武调来任参谋长。这五名支队领导接到调令后,一起到省军区报到,省军区一名副政委、政治部一名副主任接待了他们,并就新的工作对他们作了指示,提出一些要求,对他们寄予了殷切期望,因为近些年来,从省军区一次性调出这么多干部还是首次。嗣后,这五名领导又到省公安厅边防局报到。省边防局局长(公安厅副厅长)张建南同志跟王殿富作了一次谈话。张建南是王的老政委,在这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眼里,1946年入伍的王殿富永远只是一名“红小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次谈话免去了许多客套。张局长对

王讲了三条：一，你去当政委；二，屁股要坐正；三，要把各方面关系搞好，要抓好部队。王殿富同志在老领导面前还不时会露出一一点“顽皮相”，但这时，他非常严肃地向首长保证说：“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在以后的几年里，王殿富和他的战友们正是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要求去做的。

1980年春节前，广东省边防局局长张建南、副局长彭楚风、王宝石等一些领导同志亲自陪同五名支队领导到驻在花县百步梯的武警广东省支队报到。支队原来的几名领导：王海亭、祁忠堂、谭英德（原湛江边防检查站的管理科长，在省支队负责后勤方面工作）。加上新来的五人，在省边防局主要领导的主持下，开了一个会。会上，各人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然后由上级领导正式宣布了支队领导的分工：王殿富任政委、王功坚任支队长、王海亭任副政委、杨亚尧任副支队长、姜炳武任参谋长、谭英德任后勤处长、陈奕瑜任政治处主任；祁忠堂同志回黄埔检查站任站长。这次会议正式宣告了武警广东省支队第一届领导班子的建立，也宣告了这支武警部队从此走上了全面正规化建设的道路。

省支队的正规化建设，一是进一步充实部队各级领导机构，把架子搭好；二是抓好部队的训练，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能够完成上级下达的一切任务。

在这段时间内，支队又陆陆续续从解放军（主要是六团和三团）调来一些营级干部担任大队领导。支队按编制建立了4个大队，（每个大队有3个中队）这样，支队党委除了原有的7名常委，再加上8名大队干部（大队长、教导员）党委班子就配齐了，同时在支队机关设置了股，配置了股长、副股长。这样，机关的构架与功能就健全了。这个时期调进的各级领导、骨干都非常得力，如作训股股长何发菊、中队指导员徐根如、汽车运输股股长林国其、副中队长黄春生、组织股长续代生等同志，他们在支队创立初期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以后都先后调到了支队的领导岗位上。

由于武警省支队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而且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到 1200 多人,因此当时各方面条件是很艰苦的。部队没有自己的营房,只能住在百步梯公社几间三线建设下马的旧厂房里。开始时,要什么没什么,日常生活没有锅、碗、瓢、盆,军事训练没有枪,没有弹药,一切都要靠艰苦奋斗,靠白手起家。好在支队的领导都有过艰苦的历史,都不缺乏奋斗的精神。

支队的几名主要领导大部分都是从解放军边防六团调过来的或在六团服役过,王殿富担任过六团的副政委、王功坚担任过六团的副团长、杨亚尧担任过六团的副参谋长、陈奕瑜当过六团的政治处主任,……而边防六团是一支有过战功的老部队,是赫赫有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38 军独立师下属的一个团。从这个团出来的干部都有这么一股劲,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出一番名堂,与其窝窝囊囊地混日子,不如轰轰烈烈、像模像样地大干一场。支队党委一班人在困难面前非常团结,同心协力,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为了搞好军事训练,在枪支不够的情况下,他们从广东省军区借来了枪,子弹不够,通过转业到国防工业的老首长,从连山的兵工厂要到了大批子弹。有了枪和子弹,部队按照“大纲”进行了全训:单兵训练、班的训练、战术训练、五大技术的训练。支队、大队、中队领导在操场上、靶场上以身作则,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爬沟越坎,他们都是带头干。他们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纠正,一个科目一个科目地训练,既提高了战士的军事技能,又对部队进行了作风、纪律的培养、政治思想方面的教育。有这样得力的干部,战士们训练起来自然嗷嗷叫。全支队第一次射击考核,及格率就达到了 90% 以上,前来参观的省军区、公安厅、边防局首长感到非常满意。有人说,这样好的射击成绩,就是有的解放军野战部队也未必能达到。这种评价无疑对支队干部战士是一个极大鼓励。

当然,对他们的工作有满意的,也有不满意的,这就是那些从大老远来探望自己亲人的家属们。解放 30 多年了,历史都进入了 80 年代,这些半老头儿们还住在这样简陋的厂房里,还没日没夜地跟那些

大男孩摸爬滚打在一起，嘻嘻哈哈在一起，想到这些，辛酸的眼泪就禁不住地往下掉，好在这些军人家属们有一种多年培养出来的习惯；掉眼泪归掉眼泪，但从无怨，从不拉后腿，她们放下从家乡带来的大红枣、花生、核桃，洗净、补好丈夫褪色的军装，又强作笑脸离队了。

尽管当时部队的生活很艰苦，训练任务很重，但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发扬老红军、老八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帮助地方做了大量的好事，尤其是在农田建设和收割水稻的时候，往往是整个支队拉上去，全力以赴，一两天就干完，碰到星期六、星期天也不休息。武警省支队的爱民行动赢得了地方干部、群众的赞扬。人们说：花县驻有不少部队，可是这支新成立的公安部队一点儿也不比其他部队差。后来支队移防深圳，但是支队干部与花县方面的联系没有中断，每年双方都要走访、探望几次，尽管双方的领导都换过了几任，这个传统至今没有变，支队的官兵说：花县是七支队的摇篮，花县的群众说：七支队是我们的子弟兵！

二 移防深圳

1980年8月14日，广东省边防局向武警广东省支队传达了公安部和省委的指示，省支队从花县移防深圳，守卫二线，接替野战军撤走的部队。

接到命令后，支队立即派出了先遣勘查调查组，先期到达深圳地区，了解情况，以便确定部队摆在哪一线，各大队、中队设防的位置，驻地周围的环境等。先遣勘查调查组是由支队长王功坚同志带队，由机关的参谋、各中队一名干部组成的。考虑到当时支队只有0.65元一天的伙食费，而深圳地区的豆角卖到1.00元钱一斤，南瓜都卖到了0.40元一斤的现实，每个中队派出一个班提前25天到达深圳，在各布防点种上速生的小白菜、菜心等蔬菜，以缓解大部队移防后吃菜难的矛盾。

先遣组回到花县后，支队就准备移防了。当时整个支队只有两辆

解放牌卡车，两辆北京吉普，这区区几辆车显然是远远不敷使用的，支队派杨亚尧副支队长找野战军借车。不巧，他们还正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对越自卫反击战不久）汽车运输的问题没有解决，杨副支队长又跑到省军区，找过去的老领导借车。省军区同意借给省支队一个车队。这样20多辆解放牌汽车加上野战军的汽车组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车队，把武警省支队的官兵送往新的执勤岗位——深圳。

部队太多，不可能全部乘车，战士们走一段路，坐一段车；前一段行军，后一段乘车。在行军途中，各部队组织唱歌、拉歌比赛，组织防空演习、设立交通哨、组织过渡，实际上成了一次组织出色的野营拉练。

部队开到深圳后，支队领导就带领大队、中队干部进行现场勘察，了解情况，明确任务，进行布防，开展执勤。当时是一个支队领导带着一个大队组织设防。设防完了，还在大队部住几天，帮助大队解决各种问题和困难，然后才回支队。

要说困难，那个时候真困难，部队要什么没什么。当时上级拨了30万元安家费，全部用来盖了竹棚，材料是竹、席。竹子做梁，做柱，（木头都买不起）上面盖竹席。其它单位丢掉的废纸皮，部队也捡来盖在竹席上，以加强屋顶的防雨功能。在支队，支队长、政委、副支队长、副政委，四个领导合住一间；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一个部门一间；直属队是一间大通房，吃饭就是一个大伙房，支队领导与机关在一起吃，没有桌椅板凳，就抱个碗蹲在外边吃。一下起雨来，屋里屋外都是湿的，因为没有石灰铺地板，竹棚的地板就是靠人力将它夯平夯实而成。这样的条件还不是全支队都有，当时还只有5、6个中队住进了竹棚，其余的部队还住在村子里，好一点的住上了公社化时期留下的食堂、仓库，敌伪时期留下的炮楼，差一点的只有牛栏、鸭棚、鹅棚住了。战士们把它们打扫干净，把粪土铲去，铺上草，就在上面打开背包铺床。

住的条件不好，吃饭也成问题。因为当时“文革”过后不久，物资

还极不充裕,又是“计划经济”时代,买菜买肉买米买面都要凭单位介绍信。介绍信是开了不少,可各级物资供应部门都不承认,不知道从哪里钻出一个“广东支队”。支队领导为此跑了不少路,拿着邓小平批的中央 53 号“红头文件”(关于部队组建的文件)上上下下沟通关系。

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陈毅元帅也曾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面对巨大的困难,支队党委一班人没有忘记领袖的教导,没有忘记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他们把部队一安顿下来,就组织干部、战士家访、队访,与当地干部群众建立感情。许多中队都是一放下背包就清理院子、打扫街道、修桥补路,做群众工作。这样一来,军民关系很快就热乎起来了。当时,部队有困难,群众大力支援,没有盆给盆、没有锅给锅、没有灶给灶、没有柴给柴、没有米给米,连桌椅板凳也从家里往部队搬。一些村干部、支部书记都认识王殿富同志(他曾经在宝安县县革委工作过)见到他都亲热地说:“王政委,那没问题。部队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事后,王政委深情地说,现在不是战争年代,那时可以征集,现在不能征集,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有些部队真有可能一两天吃不上饭呢。部队有困难时,没有群众的帮助、支援,就会寸步难行。今后部队富了,也不能忘了人民啊!

部队当时困难,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部队新组建,没有家底。二是因为武警是一支新部队,上级领导机构还不健全,领导关系没理顺,供给渠道不畅通。支队最困难的时候,全支队的帐号上只有 3 千元钱,为此,支队长、政委要杨亚尧副支队长到兵器工业部所属的北方公司借钱,杨亚尧借到了 6 万元钱,以解燃眉之急。王功坚支队长给公安厅边防局打电话,向上级报告情况,要求赶快给支队拨款,他在电话中戏称:“如果今、明两天款到不了,就带几千条绳子来。”边防局了解情况后,立刻拨了一笔款下来。从这以后,边防局的组织机构:司、政、后也逐渐健全起来了,部队使用的经费也源源下拨,再也不用

1984年10月,王功坚支队长在边防局工作时,曾带着一千多条绳子来。 (7)